

# 汉末三国历史书写中献帝形象和正统建构博弈

罗文闻

(大连大学人文学部, 辽宁省大连市, 116622; 1908044518@qq.com)

**摘要:** 汉魏之际, 涌现出数部冠以献帝名号的史著, 这些文本通过差异化的叙事策略, 展现了不同政治立场的主体围绕汉献帝这一正统符号展开的政权合法性博弈。如献帝朝廷通过《献帝起居注》中礼法制度的记载维系汉室法统象征, 展示最后的抵抗姿态; 曹魏借《献帝传》的禅让叙事构建天命转移逻辑, 消解汉室权威, 强化自身政权起源的合法化; 孙吴史家则通过“反曹式”书写解构曹魏正统性。这些史著不仅是历史事件的记录, 更是不同政治集团通过控制历史解释权来争夺统治合法性的话语实践, 反映了中古时期正统建构的复杂多元路径。

**关键词:** 献帝形象; 历史书写; 正统建构

## 引言

作为东汉最后一位皇帝, 汉献帝三十余年的政治生命见证了三国格局形成和汉魏更迭的全部历程。在这场政治秩序的重构过程中, 围绕汉献帝形象所展开的不同书写与诠释, 使他就像一枚承载正统性的“活玉玺”, 成为观察汉魏之际各方势力为争夺政治话语权而进行角逐的极佳样本。

三国时期各方史家撰写的史料大多散佚, 幸得裴松之、李贤等注释家的征引而留存若干佚文。而专述献帝一朝的史籍, 如下表1所列:

表1 献帝史籍注引统计

作者	书目	《三国志》注引次数	《后汉书》注引次数
刘艾	《献帝纪》	15	11
汉廷近侍	《献帝起居注》	13	23
曹魏官方	《献帝传》	12	4
袁晔	《献帝春秋》	13	23

注: 《献帝纪》《献帝传》《献帝起居录》的成书时间是否为刘协被追谥孝献之前存有争议, 如若成书早于追谥, 则不可能冠以献帝之名, 应为后人所更。所列表格中注引次数, 来源于陈伟俊在《袁晔<; ; ; 献帝春秋>; ; ; 之历史叙述评议》(《东华汉学》2016年第23期)中的统计。而关于史籍作者, 《献帝纪》及《献帝春秋》的作者《隋书·经籍志》中均有记载, 而《献帝传》《献帝起居注》的作者则未在史料留名, 其撰写机构的具体考证分析, 参照徐冲《观书辨音: 历史书写与魏晋精英的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版)的第一章与第二章。

这些冠以献帝名号的史籍的涌现, 印证了汉魏鼎革之际关于献帝时代的书写备受关注, 这些书写编织了汉末三国争夺正统性叙事的话语矩阵, 反映了不同政权在献帝书写中的正统建构博弈。

## 1. 献帝朝廷的抵抗式书写

### 1.1. 宗室笔下的落难天子

《献帝纪》系东汉宗室刘艾所撰, 大抵成书于建安年间, 全书基于刘艾的见闻修撰, 虽名“纪”, 文本更偏向个人叙事的“杂史”[1]。

刘艾主要活动于初平年间献帝西迁至建安早期献帝东归之间, 捋其仕途, 曾任宗正, 汉代宗正例授以宗室, 刘艾宗室身份无疑, 且建安末代表献帝一方参与了禅让之事, 应是献帝重臣。此外, 刘艾曾任董卓相国府长史, 长史为汉代重要属官, 于三公府、将军幕府、州郡机构中普遍设置, 乃掾属之首, 董卓对刘艾的器

重可见一斑。《三国志·孙破虏传》中裴注引《山阳公载记》中董卓谓长史刘艾曰：“关东军败数矣，皆畏孤，无能为也。惟孙坚小戇，颇能用人……”[2]，董卓与刘艾探讨孙坚之患，刘艾回应中肯，也折射出两人颇密的关系。

该著虽散佚严重，但佚文仍保存了献帝的一些原始记录，为后世书写中的献帝形象塑造涂抹了底色。佚文集中记叙了三个方面内容：其一，董卓入京后废立之事及其种种恶行；其二，李傕掌权后的残暴不义之事；其三，贾诩以智谋调和凉州诸将矛盾之事。

董卓废立之事，陈寿仅简要记载结果，“遂废帝为弘农王。寻又杀王及何太后。立灵帝少子陈留王，是为献帝”[2]，而刘艾《献帝纪》则以“卓与帝语，语不可了。乃更与陈留王语，问祸乱由起；王答，自初至终，无所遗失。卓大喜，乃有废立意”[2]的微观细节式叙述，阐明了董卓废立动机。这一刻意突出献帝早慧的记载，被袁宏《后汉纪》、范曄《后汉书》等后世史书沿袭，建构起献帝的早慧形象。但献帝是否早慧，从记载的角度，仍显单薄，尤其是关于少帝的记载，为两人资质之争也提供了有疑问的视角。比如《三国志·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载董卓废帝诏令“帝天资轻桃，威仪不格，在丧慢惰，衰如故焉，凶德既彰，淫秽发闻”[2]，但《献帝纪》却载尚书卢植力陈少帝“行未有失”[2]，《后汉书》亦采此说。献帝与少帝孰贤的问题难以决断，但对于董卓来说，贬少帝可为其废立提供口实，某种程度亦可反衬献帝继位的正当性，因而其在诏令中才不留余力地贬少褒献。而刘艾此处的记载，无论是否为事实，显然有维系献帝继位合法性的目的所在。

献帝被立，直接原因便是董卓所为，虽然这使得献帝承祚的一部分正统性须靠董卓的军事实力维系。不过名分一旦确立，献帝的正统象征所拥有的强大号召力，也使得只要董卓依旧维护献帝皇统，便会有士人名流与其合作，愿意留在董氏实际掌握的政权之中。反之，如若董卓对其篡逆之心不加收敛，便会引来党人名流的联合征讨[3]。这种微妙的政治现实，使刘艾在记述董卓时采取了相对克制的笔法：既如实记载其诸多暴行，也保留其“更乘金华皂盖车”[2]等纳谏之举。即客观记叙所见所闻，并无更多明谴暗讽之言，其中应有避免因过度丑化董卓而动摇献帝继位合法性根基的考量。

而对李傕乱政时期的诸多记载，刘艾的叙事策略则转向仁德与暴虐的二元对立。“帝欲发御府缁以与之，李傕弗欲……”[2]，献帝欲调御府缁帛赈济宫人却遭李傕强占物资的细节，凸显了献帝的仁德与李傕的暴虐。而在之后应对李傕所召羌、胡之时，献帝也与贾诩商议离间了羌、胡，“傕由此衰弱”[2]，表现了献帝并非无能傀儡，而是有应对问题的能力。献帝落难的仁德明君形象，也在刘艾这些叙述中呼之欲出。

总的来说，作为最早的献帝专史，《献帝纪》从宗室视角出发，记录了献帝朝廷在董卓、李傕等军阀裹挟下的权力运作实态，并以寥寥数笔成功书写了献帝落难的仁德明君形象，其中许多微观政治场景的记叙也多为后世史家所继承，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汉臣在皇权崩解境况下挽救正统性的无奈努力。

## 1.2. 献帝朝廷最后的挽尊

相较于传统起居注侧重琐细的帝王言行辑录，《献帝起居注》虽以起居注为名，却更偏纪传体中的本纪架构。与同一时期的《献帝纪》《献帝传》相比，该著以编年体的形式，较为完整地记录了献帝即位至禅让前夕，朝廷的权力运作机制及情况，堪称三国时期最具本纪特质的献帝史著。

《献帝起居注》的编纂者很可能是建安年间活跃于许昌宫闱的士人精英群体[4]。建安之前，献帝朝廷还处于颠沛流离的状态，并不具备条件完成如此规模的撰写。安定于许昌后开始有了部分资料积累，《史通》载“及在许都，杨彪颇存注记”[5]，撰写工作应于建安年间逐步开展。徐冲便推测该书的撰写工程应是在建安十年荀悦上奏《申鉴》提出“复内外注记”后，依托许都尚书台所藏史料，由尚书令荀彧、华歆相续主导推进[6]。

《献帝起居注》除一般事迹的史事外，更重视对于献帝朝廷制度运作与礼仪实践的记叙[4]，这种书写内含了对献帝正统的维护，但因最终的汉魏禅代结局，亦可说是献帝朝廷无奈的挽尊。

首先，《献帝起居注》重视记录献帝履行天子神圣职能的礼仪实践，构建起汉室法统延续的象征性叙事，强调献帝在宇宙秩序中的核心地位。如“建安八年，公卿迎气北郊，始复用八佾”，建安八年（203年）献帝朝廷恢复立冬北郊迎气之礼，重启“八佾舞”这一天子专属乐舞。至建安二十二年（217年），“……诏书绝。立春宽缓诏书不复行”，即通过干预历法节令宣示皇权对时空秩序的掌控。而在灾异应对层面，“七月，大水，上亲避正殿；八月，以雨不止，且还殿”，即建安十八年（213年）献帝遵循遇灾“避正殿”的记录。这种书写策略与曹魏系史籍形成鲜明对照，比如还未被挟至许都的献帝于洛阳举行的第二次郊祀，《三国志·武帝纪》对此没有记载，仅强调曹操迎天子之功，《献帝传》和王沈《魏书》今存佚文也无记载，而刘宋时期范曄的《后汉书·献帝纪》则对此有详细记载，很有可能来源于《献帝起居注》。细究其源，这些象征献帝神圣职能的仪礼于曹魏的正统建构并无增益，而于献帝一方而言，这些祭祀仪礼则是显示献帝正统身份的重要象征。

其次，《献帝起居注》重视记录献帝朝廷在制度方面的建设与调整。如洛阳之变后，王允对宫廷禁制的修补，《献帝起居注》载“自诛黄门后，侍中、侍郎出入禁中，机事颇露，由是王允乃奏侍中、黄门不得出

入。不通宾客，自此始也”，这也是献帝朝廷在动荡中重建禁省秩序的一次尝试。而《续汉书·百官志》“百官受奉例。……凡诸受奉，皆半钱半谷”中，刘昭注引《献帝起居注》“帝在长安，诏书以三辅地不满千里，而军师用度非一，公卿已下不得奏除。其若公田，以秩石为率，赋（舆）令各自收其租税”，反映了献帝在长安时期以诏令形式调整财政体系的努力。此外还记叙了不少人事任命，比如建安十三年曹操“罢三公官，置丞相”时，《献帝起居注》详录了“太常徐璆授印绶”“御史大夫不领中丞”等职官细节。该著此类记载对于探究汉末经济政治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且也有意强调献帝朝廷运行的主体性，尽管西凉军阀与曹操集团相继攫取实权，但献帝朝廷依旧维持名义上的法统，掌握诏令签署、职官任免等名义上的权力，详细记录此类制度，意在强化献帝朝廷法理程序上的不可替代性。

作为汉室末年的献帝朝廷成员，刘艾《献帝纪》以宗室视角塑造了一个兼具仁德与智慧的落难天子形象，在军阀专权的夹缝中努力维持君主姿态；《献帝起居注》则通过详录礼仪实践与制度运作，在象征层面延续着汉家法统。这些书写既是对皇权崩解的现实回应，也是士人群体在政治剧变中维护汉室正统的最后努力。当曹魏的消解式书写日益强势时，这些文本也成为汉室最后的挽歌。

## 2. 曹魏的消解式书写

从现存佚文看，《献帝传》应完整记录了献帝一生，记事范围大致在中平六年（189年）献帝即位至青龙二年（234年）以山阳公身份去世，内容博杂，并与正统史传文相当接近[7]。该著在记述曹操晋封魏王、汉魏禅代以及献帝身后获谥“孝献”等关键历史节点时，大量征引了曹魏官方的诏令文书。这种对核心政治档案的娴熟运用，不仅彰显了编纂者特殊的官方身份，更揭示了其背后必然存在的政权支持——唯有曹魏王朝这一特殊主体，既具备系统重构汉魏禅代历史的强烈动机，又拥有调用国家档案的特权与能力。曹魏作为汉室直接取代者，其正统建构面临双重矛盾：既需消解汉室权威以合理化天命转移，又需继承汉制以维系统治基础。这种矛盾性深刻体现在其历史书写策略上。从这个意义上说，《献帝传》的编纂本身就是曹魏政权通过历史书写来确立自身合法性的重要政治实践。

《献帝传》现存佚文中，最为学界所重视的莫过于“禅代众事”，几近万言的文字详细记录了汉魏禅代过程中曹丕、献帝与群臣三方互动的完整图景：献帝先后四次颁布禅位诏书，群臣不厌其烦地四次劝进，曹丕则故作姿态地三度辞让，最终才以“可”字一锤定音。这种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仪式化叙事，将参与各方的言行举止编织成一个严丝合缝的政治剧本，共同演绎出一场旨在论证政权更迭合法性的华丽大戏。如此不厌其详的书写方式，绝非简单的史料堆砌，而是曹魏政权精心策划的文本政治工程。当献帝的诏书与群臣的奏章交相呼应，当曹丕的谦辞与臣僚的劝进此起彼伏，一个关于天命转移的完整叙事就此成型。这种通过文本建构合法性的努力，恰恰折射出曹魏政权既要消解汉室权威，又要确立自身正统性的深层考虑。

该著在禅让部分的文本工程主要围绕以下几点展开：

一是通过符瑞讖纬的密集运用，烘托天命转移的氛围。如辛亥日许芝“条魏代汉讖纬”[2]，提及了黄龙、麒麟、凤皇、白虎、甘露等符瑞，又援引《春秋汉含孳》《易运期讖》等典籍中的预言，更以“岁在大梁，魏之分野”[2]的天象佐证天命转移。

二是通过设计象征性细节，达到某种正统建构的政治隐喻。如禅让仪式中，御史大夫张音奉送玺绶的安排便暗藏深意。一方面是制度继承，延续此前以御史大夫册封曹操为魏公、魏王的旧制，体现权力交接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则是一种政治隐喻，张音作为汉臣代表移交权力，象征汉朝官僚体系对曹魏的集体臣服。此举既完成形式上的“和平过渡”，又暗示新旧政权在官僚认同层面彻底切割[8]。

三是圣王化曹魏家族形象，同时弱化献帝的主体性。群臣以“周公制礼”“舜禹受命”类比曹氏功业，曹丕虽表面谦称“德薄”，实则通过反复辞让与受禅的程式化表演，完成自身与上古圣王的符号绑定。而对于献帝的刻画，则进行相应的弱化。严可均在《全三国文》中将禅让文书《乙卯册诏》等皆归于卫觐名下，“是献帝诸禅诏，皆卫觐作也”[9]，此事真伪无法定论，但诏令书写并不由献帝一方主导应是事实。如献帝在《乙卯册诏》等诏令中，被迫以“汉道陵迟”“大乱兹昏”等表述自我贬损，同时将曹操塑造成“拯兹难于四方”的救世主，愿追踵尧典禅位魏王，使事实上的暴力夺权披上了“天命—贤能”逻辑下正当传承的禅让外衣。

但值得注意的是，《献帝传》对献帝的弱化处理并未有意导向对曹魏的负面评价，更多集中于献帝的自贬，是一种消解式书写，这与吴人史家的“反曹”叙事形成鲜明对比。吴人袁晔在《献帝春秋》中载“献帝都许，守位而已”[10]，暗讽了曹操的僭越，否定曹魏皇帝权力起源的正当性，并为范晔《后汉书》沿袭。两者弱化献帝形象的书写策略之不同，也折射出曹魏与孙吴之间正统建构的需求差异。

曹魏既然选择“禅让”模式完成王朝更替，对于旧王权的正当性和自身臣子身份，便不能直接粗暴的否定，以致过于损害曹魏在献帝朝廷“功臣”的形象，因而采用了消解式书写的策略。孙吴则没有曹魏以功臣身份代汉的负担，其正统建构的最大障碍实际上是代汉的曹魏，应而主要通过“反曹式”书写，否定曹魏权力来源的正当性，以实现对自身正统的建构。

### 3. 吴人的“反曹式”书写

《献帝春秋》大致成书于吴国后期，记事范围约为汉灵帝熹平二年（173年）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袁晔作为孙吴史家，其叙事立场深受吴国政治语境影响。在留存的佚文中，袁晔对献帝的书写着墨较少，未如曹魏史官般刻意消解其权威，更多是客观描写汉室的衰微，着重通过“反曹式”书写策略，解构曹魏的正统建构，以此呼应孙吴政权对汉室余晖的政治借重。

“献帝都许，守位而已。宿卫近侍，莫非曹氏党”，这句话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吴人看待献帝的态度。这种态度主要源于东吴特殊的政治处境——既无蜀汉“绍汉”的血统合法性叙事之便，亦无曹魏“代汉”的政治合法性叙事之利，因此反而能够相对客观地呈现献帝作为政治符号的尴尬处境。当孙吴史家将献帝定位为“守位而已”的角色时，实质上也就间接否定了曹魏皇帝权力起源的正当性，这种看似中立的“背景化”处理，恰是吴人史观中“反曹”立场的隐性表达。

而袁晔在以“反曹”立场进行献帝时代的历史书写时，主要采取了两种叙事策略。一是直接贬抑曹操，二是褒扬反曹势力如袁绍，间接贬曹。

检视该著关于荀彧之死、杨彪入狱等记叙，皆可突显曹操不臣之心。陈寿对荀彧之死的记叙如下：“十七年，董昭等谓太祖宜进爵国公……彧以为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太祖军至濡须，彧疾留寿春，以忧薨，时年五十。谥曰敬侯。明年，太祖遂为魏公矣。”[2]荀彧希望曹操“秉忠贞之诚”，勿在篡汉之事上冒进，曹操对此“心不能平”。陈寿一个巧妙的“遂”，强调了荀彧之死与曹操加封魏公的因果关系，可以推测陈寿认为荀彧尚有维护汉室之心，是曹操更进一步的障碍。《献帝春秋》亦认为荀彧与曹操之间有嫌隙，但又呈现了荀氏的另一脸谱：“董承之诛，伏后与父完书，言司空杀董承，帝方为报怨。完得书以示彧，彧恶之，久隐而不言……彧卒于寿春，寿春亡者告孙权，言曹操使彧杀伏后，彧不从，故自杀。权以露布于蜀，刘备闻之曰：‘老贼不死，祸乱未已。’”袁晔笔下的荀彧犹豫不决，与传统记叙中的王佐之才大相径庭，但整体叙述还是聚焦于曹操杀荀彧之过，并借刘备之口大骂曹操。

还有诸如曹操诬陷杨彪之事，《后汉书》载“建安元年，从东都许。……时袁术僭乱，操托彪与术婚姻，诬以欲图废置，奏收下狱，劾以大逆”[11]，《献帝春秋》补录了孔融指责曹操的对话，“刑之不滥，君之明也。杨彪获罪，惧者甚众”；在刘备与孙权关于取蜀之事上发生争议时，该著记叙刘备评论曹操“虽有无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这些记载皆可突显曹操不臣之心以及剔除异己的企图，并且此种借他人之口谩骂亦或暗讽曹操之语，在其余献帝专著中较为罕见，可显袁晔贬抑曹操之意。

另一方面，《献帝春秋》对袁绍着墨甚多，存在褒袁贬曹之意。正史或曹魏历史诠释系统中，对于袁绍的书写，多将其视为军阀乃至乱臣贼子，如曹魏官方史家王沈的《魏书》，与此恰成对照，袁晔之外的另一位吴人史家谢承的《后汉书》存在相似的褒袁贬曹迹象[12]。诸如《后汉书·袁绍传》载袁绍遇郡兵与黑山贼共覆邳城之事，李贤注引《献帝春秋》“绍劝督引满投壶，言笑容貌自若”，呈现袁绍遇事从容之态；《后汉书·袁绍传》中亦征引了《献帝春秋》“袁，舜后。黄应代赤，故包有此言”此类讖纬之说；而《献帝春秋》另一条史料“绍为人政宽，百姓德之。河北士女莫不伤怨，市巷挥泪，如或丧亲”，则反映袁绍在河北深得民心。

在洛阳之变中，陈寿笔下的袁绍在面对董卓废帝的提议时，采取了一种虚与委蛇的姿态，最终以“绍不应，横刀长揖而去”[2]作结，而《献帝春秋》中的袁绍形象更为激烈，敢与董卓正面冲突，并维持了忠汉姿态，认为“汉家君天下四百许年，恩泽深渥，兆民戴之来久”，反对董卓轻行废立，并怒怼董卓“天下健者，岂唯董公”。而对袁曹之间的矛盾，该著亦有书写袁绍怒骂曹操“曹操当死数矣，我辄救存之，今乃背恩，挟天子以令我乎！”，构建袁绍施恩，曹操背恩的叙事逻辑。

总而言之，袁晔的政治倾向较为明确，在《献帝春秋》中对献帝形象的书写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矛盾性，一方面通过汉臣的抗争彰显献帝的符号价值，另一方面又默许其“守位而已”的傀儡实质，并将笔墨更多投向掌握政治实权的曹操与反曹势力袁绍。其对曹操多采取贬抑态度，而对曹操重要敌人袁绍给予较为正面的刻画，此种书写立场及特点，又与《曹瞒传》、谢承《后汉书》等吴人史籍相呼应，背后似乎有共享的话语网络。这种“反曹式”书写特征恰与孙吴“借汉旗而自立”的政治现实形成呼应，本质上是以历史叙事参与吴国正统建构的产物，因而呈现某种政治隐喻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张力。

### 4. 结论

通过对四部汉末三国时期冠以献帝之名的专著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以下认识：首先，汉魏之际的历史书写呈现出鲜明的政治工具性特征，各政权均通过特定叙事策略将献帝形象符号化，使其服务于本集团的正统建构需求。其次，正统之争存在多种模式——献帝朝廷的以礼法象征为主的抵抗式书写、曹魏的以禅让叙

事为主的消解式书写，孙吴的以解构曹操正统性为主的“反曹式”书写。这种以历史书写为载体的正统性博弈，不仅塑造了后世对汉魏禅代的历史认知，对比审视这些献帝专著叙事中呈现的差异性与矛盾性，也为理解中古时期的正统之争提供了重要观察视角。

## 参考文献

- [1] 徐冲.《献帝纪》与《献帝传》考论[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23-34.
- [2]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2011.
- [3] 陈勇.董卓进京述论[J].中国史研究,1995(4):109-121.
- [4] 徐冲.《献帝起居注》与献帝朝廷的历史意义[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0(4):40-49.
- [5] 刘知幾.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
- [6] 徐冲.观书辨音:历史书写与魏晋精英的政治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 [7] 熊明.汉魏六朝杂传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4.
- [8] 孙正军.禅让行事官小考[J].史学集刊,2015(2):26-36.
- [9] 严可均.全三国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10] 张立.《献帝春秋》钩沉:从数字人文角度看古籍辑佚[M].秦皇岛:燕山大学出版社,2021.
- [11]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4]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2011.
- [12] 陈伟俊.袁晔《献帝春秋》之历史叙述评议[J].东华汉学,2016(23):63-100.